

人口研究资料 (25)

一、北京黄村卫星城调查

王向明 陈玉光

二、1981年北京市人口出生情况

北京市人口学会编印

1982年4月

北京黄村卫星城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口理论组

王向明 陈玉光

打开北京市地图，可以看到在首都南郊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就是北京市大兴县人民政府的所在地——黄村镇。解放初期，黄村镇仅仅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汉回混居的自然村。当时的县府设在本县的青云店。1954年迁到黄村。此后，这个自然村的经济生活和面貌逐步发生了变化。从1975年开始，随着中央和市属企业单位在黄村镇的迅速发展，这个建国初期的农业自然村已变成一个以建筑业、轻纺工业为主体的城镇。1979年市委决定将黄村镇作为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卫星城之后，城镇建设的进程大大加快。到1980年，全镇人口由解放初期的7~8千人增加到58,000人；工业职工人数（全民和集体）增加到12,949人；工业总产值达8,900万元；城镇住宅面积达到24.7万平方米（不包括农业人口住宅）。与此同时，城市的公用事业、服务行业和文教卫生事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按照卫星城总体规划的初步设想，在未来的十年内，要发展成为一个以轻纺工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为骨干的具有十五万人口的卫星城市。

最近，我们对黄村卫星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深深地体会到，认真研究和探讨大城市卫星城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控制现有大中城市继续盲目膨胀和解决我国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卫星城的作用

建国以后，北京市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不仅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在“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口号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的影响下，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多年来人口和工业的高度盲目集中，北京市现有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结构与首都的性质和要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把首都经济的合理布局和疏散人口的希望寄托在发展卫星城上。据我们所知，北京市城市规划局过去曾计划在市周围建设十几个卫星城镇。
1979年确定先建设昌平、通县和黄村三个卫星城。

刚刚起步的黄村卫星城，对人口和经济高度密集的北京市和地方经济来说有哪些作用？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根据我们的实际调查，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农村人口向首都城区的流动起了一定的截流作用。

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人口和工业的盲目片面发展，是造成目前首都人口和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问题的解决当然也必须从人口与经济两方面采取措施。就人口而论，既要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又要控制人口的机械增长。控制首都城区人口的增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困难很多。需要作认真的调查分析、全面考虑和严格掌握。人口的机械增长往往是同企业的新建、扩建和各类机构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建设和发展卫星城的方式，把本来打算迁进市内的或建立在市内的企业事业机构及其人员迁到远郊区县，对控制首都人口的机械增长，减轻首都人口问题的压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黄村卫星城的发展，从两个渠道控制了人口向城区的流动：一是，对搬迁式企业的截流作用。以国家建委一局二公司为例，该公司原在湖北

荆门承担基本建设任务。后经国务院批准，1975年迁入本市卫星城。支援首都的基本建设。几年来，该公司先后有约1万人口（包括家属，其中有职工2624人）在黄村镇安家落户，有效地控制了这部分人口向城区的一次大流动。目前正在筹建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如印刷学院、政法学院、铁道兵研究所等单位等都计划安排在黄村镇，同样将对首都城区人口的机械增长起着一定程度的截流作用。

二是，地方企业单位的截流作用。近几年来，在市级以上企业（包括中央部、委及北京市所属各企业，下同）的帮助下，大兴县下属地方工业和事业单位发展很快，如大兴农机厂、大兴酿酒厂、塑料编织厂、印刷厂等等。先后安排了约一千多名非农业人口就业，其中北京市城区的青年约500名。这个数字虽不大，但毕竟直接和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首都地区人口的压力。

应该看到，卫星城镇对人口的截流作用。如果从较长的时间看，不仅表现在直接地控制了城区人口的机械增长，而且为为进一步降低城区未来人口的自然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卫星城镇机械增长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年青人。一旦这部分人口进入市区，必然会加大育龄人口的比重，从而也会给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带来一定的困难。

第二，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合理布局和改善首都的环境质量。

建国以来，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支配下，首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超过了合理的限度，与首都的性质和美化环境的要求很不适应。从北京市在业人口的构成上看，工业人口（包括建筑业在内）的比重约占总在业人口的54.2%，远远高于经济发达国家首都工业人口的比重；从国家的基建投资比重来看，截止到1978年，工业方面的投资占88.8%，农业投资占11.7%，在工业

投资中，重工业投资占77·6%，轻工业仅占10·7%。特别是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人数多，比重大。而这些企业又往往是用水多、耗能大、运量大、污染严重的单位。这种经济结构，给首都人民的生活和环境质量带来严重威胁。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关系到首都几百万人民在什么样环境里生活的一件大事。黄村卫星城的建立和发展，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几年来，在黄村镇先后新建和迁入十二个中央和市属企业：建委一局二公司、建委构件厂、物资总局剪板厂、北京塑料厂和床单厂、液压机械厂、化纤厂、铸铝厂管件厂、粉末冶金厂、玻璃厂、硅酸盐厂。其中有些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污染性质。这十几个企业的总人口达1万余人。他们迁入或建立在黄村镇，既有利于首都城区人口和经济的合理布局，又有利于改善首都的环境质量。

中央书记处去年对北京市城市建设的方针明确指出，首都的城市建设必须贯彻四个中心（全国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国际活动和旅游中心）的原则。要贯彻这些原则，必须改善经济合理布局，因此，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搞好首都卫星城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

在五、六十年代，黄村镇的地方工业只有少数农产品加工和农机修理厂。自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从1975年以后，由于市级以上企业的支援，黄村镇的地方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市级以上企业相对说来，拥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较强的技术力量，具备了扶植地方工业发展的条件。这些企业按照互利的原则，在征用地方社队的耕地建厂以后，从设备和技术方面先后帮助地方和社队建立了县属建筑工程队、大兴塑料编织厂、塑料接管厂、床单厂等小工业，不仅改变了地

方工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体的单一结构，而且还为社队工业培养了约五百人的农业户口的生产工人。

黄村卫星城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件新鲜事物。它对逐步减轻北京而城区人口和经济的压力、繁荣地方经济以及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作用，现在虽然还远未充分发挥，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卫星城的发展，这些作用终将日益充分地显现出来。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

黄村卫星城的建设还刚刚起步，作为卫星城的应有作用有的还未显现，有的也只见端倪；但是，从眼前的事实看，问题不少，主要是：

第一，大城市的引力过大，阻碍人口和工业的疏散。黄村现有十几个较大的工业企业，都是部、委市属的企业。这些企业有的从北京市迁来，有的在这里新建，有的从外地迁来，但是，职工大都来自北京市区。许多人身在黄村，心在北京，安心在此落户定居的少。目前城镇全部在业人员共2.5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的2.28万人。家住北京市区每天来此上班的职工竟有万人左右。很多人每天往来途中的时间达四小时左右。不但职工本人非常辛苦，而且严重影响了实际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交通费等支出。有的企业因为大部分人早晨不能按时到厂，实际默许九时上班（只要早晨八时到达永定门车站就算按时上班，而且永定门站到黄村镇，公共汽车约需四、五十分钟）。例如，某塑料厂现有职工1.700多人，其中家住北京市区需要每天由市区来此上工的约1000人，接近60%，厂里每月支付职工交通补助费即达五、六千元，现在职工中请调回京的，应接不暇。厂里劳动科每天上午八时到十时，要抽出两小时处理这个问题。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如宿舍不够，福利设施差，市区与郊区物质条件和教育文化条件差别大以及家属、社会关系的牵挂等等。

从工资和商品供应看，北京是六类地区，黄村原属四类。不久前改为五类，远不如北京。从教育条件看，郊区教育水平低。据黄村教育局反映，这里中学的优秀生到北京市区后有的跟不上班。为此很多职工不愿子女在此上学，以免影响升学。这些都增加了北京市疏散人口的阻力。

北京市调往郊区城镇工作的职工，不愿迁户移居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据北京市统计局计算，清河、长辛店、通县、黄村、昌平、沙河、南口、顺义（城关）、房山（城关）、大峪、石景山区、石油化工区等12个城镇，1979年底职工已达27.7万人，占全市19.7%，而这些地区常住人口占全市的比重只达9%。估计每天由市区到郊区城镇上班有十几万人。卫星城的建立并没有改善这种状况。这是建设卫星城镇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投资大，建设资金来源有问题。

卫星城的建设投资大大高于小城镇建设。以黄村卫星城为例，辖区内的工业企业虽还不多，近几年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已达一亿多元，包括尚未实现的计划投资额估计有8亿多元。已形成的固定资产共计7800多万元。这些都是部、委和市属企业的投资。而其中还有一部分搬迁企业，如一律新建，则所需投资更大。而这些投资的大部分又都是短期内得不到经济收益的。此外，几年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共达一千多万元（这些资金都是由在黄村镇的市级以上各企业、事业单位按各单位计划投资额3%集资而来的）。如果国家不投资，地方财政是没有能力进行这些建设的。1980年大兴县的全部财政收入只为二千万元，绝大部分要用于农业。城镇维修费只有廿多万元，不够现有城镇公用事业的维修费。黄村镇现正建设一个污水处理站，按设计基建投资要600万元，而现有资金只有200万元，缺400万元。

这个站建成后，每年开支就要40万元。现在的全部市政维修费也不够这一项开支。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为了压缩基建投资，消灭财政赤字，国家用于建立卫星城镇的投资不可能很多。这与需要投资较大而又主要依靠国家的卫星城的建设是有矛盾的。看来，卫星城的建设必须量力而行，而且绝不能只靠国家投资。而必须逐渐增多地依靠地方的资金。其出路：一是辖区内的上级企业要与地方企业搞好分工协作关系，支援、带动地方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由此扩大地方财源。而就黄村镇来说，现有地方企业不少处于萎缩甚至停工、半停工状态。例如农机一、二厂已停产，酒厂产品滞销，生产不振。现在虽讲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而由于信息不通，缺少指导，地方企业领导往往胸闷不明，心中无底，不知所措。不改变这种状况，地方经济活不了，卫星城的建设投资只能依靠国家；二是要通过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使地方有较大的财力和支配资金的权力；三是要善于吸收、利用集体经济的资金和社会资金，如正确执行支持城镇劳力集资办企业的方针以及通过银行信贷手段吸收利用社会闲散资金。总之，卫星城的建设必须靠两只手推磨，一手靠国家，一手靠集体和社会资金。否则，难以迅速前进。

第三、征地与招工中城乡、工农矛盾很突出。

从长期发展远景来说，卫星城的建立很有利于其周围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农民转为工人；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工农之间也有其矛盾的一面。例如中央部、委和北京市各企业事业单位在黄村镇征购耕地作为基本建设用地而又不能将失地的农民招为工人就是这个矛盾的突出表现。黄村公社有的生产队原来人均耕地一亩多，现在只有几分地，劳力过剩难以安排。而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规定一般不能招收农业社员当工人。此外，市里

待业青年多，各单位招工又必须首先照顾市区青年就业。当地待业青年就业机会较少。这些都使农民很有意见。有的企业，就由于这个问题难以解决而与生产队在征购土地上长期达不成协议，设计施工，无法进行。

当前在卫星城的建设中，很多单位征购土地宽打备用，甚至越大越好，以致占地过多，更加重了上述矛盾。例如黄村镇土地面积共 85909 亩，现有十几个工业企业占地即达 3109 亩，占 9%，这还不包括住宅建设和市政建设相应扩大要占的土地。随着城镇工业和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占地面积必然还要日益扩大。显然，卫星城的建设中，节约用地是一个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

第四，改变卫星城周围农业生产结构以适应卫星城市发展要求问题。黄村镇现在蔬菜价格一般反高于北京市区，出现蔬菜倒流问题。这反映现在黄村农业生产结构与城镇居民需求不相适应。据黄村镇社干部反映，不久前市委指示，黄村公社所辖生产队应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将主要农产品的位次由原来的粮、棉、油、猪，改为菜、果、牧、粮。这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必要的。可是如何合理调整以及调整后农村产品收购价格，供应方式和工、农关系的处理都有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如何实行切合实际的计划指导，又涉及如何灵活运用市场调节的机制。这些对规模和社队干部来说都是新课题，处理不当，对郊区农业生产和服务居民生活都有巨大影响。

以上几个问题的产生，都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历史条件。城乡经济文化水平差别大这个最根本的因素来说，它是长期历史因素造成的。而它却是大城市具有巨大引力，成为疏散大城市人口最大阻力的因素。缩小和消灭这个差别则需要长期过程。劳力过剩也是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人均耕地少，还会因人口增加和建设的扩

大而缩小。至于对卫星城建设投资的扩大，这取决于整个国民经济情况的调整和发展以及地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地方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等。这些都不是短期内就可能完全解决和取得成效的。所以，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来看，大城市的卫星城的建设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上述客观条件和特殊因素，使社会主义大城市卫星城的建设完全不同于生产力水平高、城乡对立但经济文化差别小、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卫星城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大城市卫星城的职能和要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资本主义建立大城市卫星城的做法，应从国情出发，探讨建立自己卫星城的途径和方法。

（三）从黄村卫星城的建设看我国人口城市化

卫星城的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大城市盲目发展的派生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城市不应该盲目发展，大城市卫星城的建设也应该有计划地进行。恩格斯早就指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它们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反杜林论》见《马克思选集》第三卷386页）列宁在论“土地问题”时曾经指出，在运输技术非常发达的条件下，要让大体平均分布的全国居民，共同享受少数中心城市积累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现在我们建设已经畸形发展的大城市的卫星城，可以说既是消除它们在大城市中留下的不能令人满意的遗产，又是使少数中心城市积累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

让更多的分布比较均衡的居民得以享受的途径。我们党早就制定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城市建设方针，是与马列主义关于城市建设的远见相符合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长时期内人口盲目发展和工业建设偏向大城市集中，雪球越滚越大，大城市日益膨胀，日益增多。1978年我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达56座，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10座，100~200万人口的19座。这56座大城市的人口达8300多万人，占城市人口总数的73%。从1949年到1978年全国城市人口增加1900多万人，其中近60%，增加在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现在这些大城市都有沉重的人口和经济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还会日益加重，这是我们在人口城市化问题上的一个严重的战略性的失误，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

大城市畸形发展的恶果现在已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了。吃饭、住房、上学、看病、走路等等到处紧张，环境质量日益恶化。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已有深切的体会。我们现在建设大城市的卫星城，最现实的任务之一就是减轻大城市人口和经济的压力。

从黄村卫星城建设的实践来看，对我国当前条件下大城市卫星城的建设应如何估价？对大城市人口问题的解决如何看？从一个刚起步的卫星城的一次调查当然回答不了这些大问题。这里，我们只是谈谈从调查中得到的一些初步认识。大城市卫星城的建设，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认为，大方向应该肯定。从现实的情况看，在有条件的地区也应该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但是，一般说来，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不要急于求成或当作当务之急。理由主要是：建设卫星城投资较大，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资金困难，不宜大搞。只能量力而行，同时在当前我国城乡差别、大城市和小城镇差别很大的条

件下，如以拆迁工厂为主来搞卫星城的建设，问题很多，阻力很大。大城市的引力越大，疏散人口和工业的阻力也越大。

建设大城市的卫星城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在大城市的周围因地制宜建立起若干规模不等、各具特点的卫星城镇应是改造和建设大城市长期规划的内容。卫星城镇的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同时必须看到，卫星城与中心城市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极为复杂的经济上的分工协作横向纵向的联系。行政上的上下左右指挥、合作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上的婚姻、家族和心理上的种种牵连，这些都是需要精心研究，全面规划，细致安排，逐步解决的。

对于畸形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建设卫星城是改造畸形的现状使之逐步合理化的重要途径。这是要花费巨大代价的。例如以拆迁工厂为主来建设卫星城就不能没有较大的损失。问题在于我们要把这个损失减少到最小，并且要通过建设卫星城带动远郊区工农业的更快发展来弥补和超过这种损失，这是改造大城市建设卫星城长期规划中应该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大城市的改造来说，建设卫星城只是改造的途径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途径，而且也不是轻而易举可收速效的途径。因此，对已经十分膨胀的大城市的严格控制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控制，首先是严格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同时还必须严格控制工业和其它各项事业的盲目发展，并应根据地区经济的特点和城市的性质逐步改进工业的经济、技术结构。例如上海市正在研究要使这个中国最大的畸形发展的城市的工业逐步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就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从卫星城的建设来看人口城市化问题，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到

大力发展战略小城镇的重大战略意义。小城镇的建设投资少，收效快，特别是可以大大节省国家投资。而它们在促进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充分合理利用各地人力和自然资源加快经济发展以及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等方面都有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是有待专门调查研究、深入讨论的问题。这里要指出的只是：小城镇的大量发展对控制和改造大城市也有重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吸收工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从农村溢出的亿万人口，防止他们涌向大城市。这对大城市来说，可以在十分广阔的范围内起着巨大的远远超过卫星城的截流作用。所以不论从吸收农村过剩人口还是从控制大城市人口来说，不论从我国当前国情还是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说，都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是我们在研究大城市卫星城的建设问题时，必须扩大视野，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1981年北京市人口出生情况

根据市公安局1981年新生儿入户统计，全市共出生婴儿151,223人。出生率为 $16\cdot9\%$ ，比1980年多出生14,409人。出生率提高 $1\cdot35\%$ 。1981年共死亡58,807人，净增人口97,416人。自然增长率为 $10\cdot9\%$ 。全市常住人口截至1981年底共有9,008,208人，其中城市人口5,228,941人，农村人口3,779,267人。

1981年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市共有857,095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占全部已有一个孩子育龄夫妇的85%。其中四个城区和石景山区都在96%以上。海淀、丰台两区达94%以上。在1981年出生的全部婴儿中，第一胎占86·57%，二胎占11·27%，多胎占2·16%；属于计划内生育的占89·84%。城市人口计划生育率达98·24%。

1981年全市共有198,840名女青年结婚，其中23岁以上结婚的占78·36%，全年结婚人数比1980年多5万多对。

1981年全市计划外生育的还有一万六千多人。其中生育三胎的还有三千多人。主要问题在农村：密云县、门头沟区计划外生育的还占出生总数的20%以上；多胎率在5%以上的区县有：门头沟、平谷、密云、大兴、延庆。

附表：《1981年北京市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摘自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计划生育工作简报》1982年第一、二期

分类 区县	全 市			城 市			农 村		
	出生‰	死亡‰	自增‰	出生‰	死亡‰	自增‰	出生‰	死亡‰	自增‰
东城	15·68	5·92	9·71	15·68	5·92	9·71			
西城	14·98	5·48	9·50	14·98	5·48	9·50			
崇文	17·04	5·89	11·15	17·04	5·89	11·15			
宣武	16·14	5·94	10·20	16·14	5·94	10·20			
合计	15·81	5·78	10·02	15·81	5·78	10·02			
朝阳	15·81	5·18	10·68	12·74	4·16	8·58	24·02	7·72	16·80
海淀	18·28	4·89	8·85	11·42	3·58	7·84	20·81	7·76	18·04
丰台	16·58	5·04	11·58	13·98	4·15	9·83	22·23	6·99	15·25
石景山	16·57	4·41	12·16	15·86	3·86	12·00	21·84	8·51	18·88
门头沟	17·75	6·72	11·08	14·68	5·01	9·61	21·96	9·02	12·93
石化	22·84	2·61	20·28	22·84	2·61	20·28			
合计	15·58	4·90	10·68	18·22	3·94	9·28	22·45	7·77	14·68
昌平	18·49	7·16	9·38	15·85	4·08	11·83	16·72	8·29	8·44
大兴	16·19	6·69	9·50	17·88	3·89	18·44	15·98	7·18	8·80
房山	18·55	7·08	11·47	18·83	4·78	9·05	19·77	7·67	12·10
通县	19·32	7·19	12·12	16·66	4·80	11·86	19·96	7·78	12·19
顺义	18·57	7·90	10·67	22·76	3·47	19·30	18·15	8·33	9·88
怀柔	18·64	7·03	11·61	26·82	2·15	24·16	17·64	7·36	9·98
密云	21·51	6·71	14·80	27·68	3·18	24·45	20·69	7·19	18·50
平谷	23·44	6·62	16·82	31·79	2·11	29·68	22·75	6·99	15·76
延庆	16·59	7·69	8·60	25·49	2·48	23·00	15·17	8·58	8·64
合计	18·82	7·12	11·69	18·88	3·94	15·08	18·79	7·72	11·07
全市总计	16·91	6·02	10·90	15·08	4·78	10·25	19·51	7·72	11·79